

# 关于今传《周易乾凿度》文本构成的再考察 \*

张学谦

---

**内容摘要:**《周易乾凿度》卷上与卷下是不同时代的文本,其中卷上形成于西汉,保存了一些汉初乃至先秦的早期易说,卷下则是两汉之际据卷上大幅增衍而成,是汉代象数易学的产物。今传本卷上注文并非郑玄注,而是西汉佚名之注,郑玄《乾凿度》注仅部分保存在今本卷下中。卷上、卷下原本各自单行,隋唐文献征引所据皆为卷下。唐代中期,有人将卷上、卷下拼合,并删去卷下与卷上重复的文字,形成今传二卷本的面貌。

**关键词:**周易乾凿度 郑玄 文本 纬书

---

一

《乾凿度》是汉代《易纬》中的一种,其篇名和文句最早见于东汉的《白虎通》中,历来频为他书如《续汉志》、《后汉书》、南北朝诸史、孔颖达《周易正义》、李鼎祚《周易集解》等征引,在诸纬中最受重视。《乾凿度》卷上中保存了一些先秦或汉初的早期易说,以“孔子曰”的形式对《周易》经文、经义进行了阐释(这种形式也是对早期易说的沿袭),与其他纬书相比,显示了更为明显的“解经”特色,故清人卢见曾以之为“先秦之纬”,称“其辞醇”,<sup>①</sup>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亦云“说者称其书出于先秦……于易旨有所发明,较他纬独为醇正”。<sup>②</sup>当然,保存早期易说并不代表《乾凿度》就是先秦之书,但毕竟显示了其价值。随着出土文献的不断增加和学术研究的持续进展,学界越来越认识到早期文献的文本复杂性。对于汉代纬书文献知识体系的驳杂,学界已有公认,但对现存纬书的文本复杂性的认识却还远远不足,而《乾凿度》恰恰是现存纬书文献中文本构成颇为复杂的一种。

据《后汉书·樊英传》李贤注,七经纬中,《易》有《稽览图》《乾凿度》《坤灵图》《通卦验》《是类谋》《辨终备》六种。隋唐时期,《乾凿度》是作为《易纬》中的一种,与其他各篇一起,以一个整体的形式流传,《隋书·经籍志》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中并无单篇流传的《乾凿度》。但到了宋初的《崇文总目》中,除了“《易纬》九卷”外,还著录有“《周易乾凿度》二卷”,可见当时已经出现了单行本。现存《周易乾凿度》的主要版本有:(一)明嘉靖中四明范氏天一阁刊本,收入范钦辑《范氏奇书》。(二)清乾隆二十一年德州卢氏雅雨堂刊本,收入卢见曾辑《雅雨堂藏书》。据卢见曾序,底本为“嘉靖中吴郡钱君叔宝藏本”。<sup>③</sup>钱叔宝即钱谷(1509—1572)。(三)清乾隆三十八年武英殿刊《易纬》八种本,收入

---

\* 基金项目: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“谶纬辑佚史研究与谶纬文献的重新校理”(项目编号 19CZS006)阶段性成果。

① 卢见曾:《周易乾凿度序》,《周易乾凿度》,清乾隆二十一年德州卢氏雅雨堂刊本,卷首,第 1a 页。

② 《四库全书总目》,中华书局,1965 年,第 46 页。

③ 卢见曾:《周易乾凿度序》,《周易乾凿度》卷首,第 1a 页。

《武英殿聚珍版书》。此本乃四库馆臣从《永乐大典》卷一四七〇八“度”字韵中抄出，并校以钱本（即卢本）。此卷《大典》尚存，其中《周易乾凿度》未分卷，可知殿本分卷实据卢本。当然，《周易乾凿度》还有许多其他版本，但都是以上三种版本的衍生品，此不赘述。这三种版本中，殿本收入《四库全书》、《四库全书荟要》，《武英殿聚珍版书》又屡经翻刻，流传最广，影响最大，各种纬书辑本所收《乾凿度》多以殿本为据。但从整体上看，三本之中，卢本最佳，往往有二本皆误而卢本不误处。故本文以卢本文字为据，遇有卢本误处，亦参考其余二本。

## 二

今传《周易乾凿度》分为上、下两卷，卷上主要是易说，阐释《周易》经文、经义，卷下则主要讲象数易学，将易数和历数结合，创造新占术。对比卷上与卷下可以发现，卷下开头的部分与卷上正文彼此颇有重复，注文则异，各版本均是如此。四库馆臣在殿本《乾凿度》按语中已经指出这一点，但未作解释。<sup>①</sup>对于今本存在的这种正文重复而注文有异的情况，研究者多解释为今本混入了郑玄以外的注文，但又难以进行区分。<sup>②</sup>钟肇鹏怀疑《乾凿度》原书唐以后残阙，宋人将郑玄、宋均二家注本混钞，并题为郑玄注。<sup>③</sup>但以上研究并未就具体文本进行详细论证。而通过比对文本，李学勤敏锐地指出，《乾凿度》卷上、卷下在体裁和内容上都有差异，是象数易学不同发展阶段的产物，故两卷原非一书，而是被后人拼合在一起。<sup>④</sup>李氏考证《乾凿度》卷上、卷下分别属于不同时代的文本，首次揭示出《乾凿度》的文本复杂性，可谓卓识。同时，李氏还认为重复段落为“同出一源的不同传本”，其中的“郑注彼此呼应，互相补充”，进而推测郑玄作注时已经存在这种重复，即当时上下两卷已经拼合在一起。这就涉及到三个问题：（一）卷上、卷下重复文字的关系。（二）其中的注文是否全为郑玄注。（三）今传二卷本拼合的时间。在这三个问题上，李氏的观点颇有可商处。

关于第一个问题，先看一个李氏征引过的重复段落：

《乾凿度》卷上	《乾凿度》卷下
孔子曰：自成汤至帝乙。帝乙，汤之玄孙之孙也。此帝乙即汤也。殷录质，以生日为名，顺天性也。玄孙之孙，外绝恩矣。（玄孙之孙，五世之末，外绝恩矣。）同以乙日生，疏可同名。（同以乙日生，天锡之命，疏可同名。）汤以乙生，嫁妹，本天地之义，顺阴阳之道，以正夫妇，夫妇正，则王教兴矣。 <sup>⑤</sup> 故曰：《易》之帝乙为成汤，《书》之帝乙六世王，同名不害以明功。（《易》与《尚书》俱载帝乙，虽同名，不相害，各以明其美功也。）	孔子曰：自成汤至帝乙。帝乙，汤玄孙之孙也。帝乙则汤。殷录质，（王者之政，一质一文，以变易从初，殷录相次质也。）以生日为名，顺天性也。玄孙，五世之末，外绝恩矣。同日以乙，天之锡命，疏可同名。（仁恩已绝，则不能避，故小殷以是日同，故曰“天之锡命”矣。）汤以乙生，嫁妹，本天地之义，顺阴阳之道，以正夫妇，夫妇正，则王教兴。（正夫妇者，乃所以兴王教于天下，非苟也。）《易》之帝乙为汤，《书》之帝乙六世王，名同不害以明功。（《易》与《尚书》俱载帝乙，虽同名，不相害，各以明其美功也。）

这段文字主要是为了解释《周易》和《尚书》中的两个“帝乙”并非一人。先引“自成汤至帝乙”一句，此为《尚书·多士》之文（“自成汤至于帝乙，罔不明德恤祀”），然后解释这个帝乙是“汤之玄孙之

<sup>①</sup> 殿本按语云：“按此节与前……一节并复见下卷，辞句微异，郑注互有详略，原本及钱本具同，今仍之。”（《周易乾凿度》，清乾隆三十八年武英殿刊本，卷上，第13b页）

<sup>②</sup> [日]铃木由次郎：《汉易研究》（增补版），东京：明德出版社，1974年，第351—352页。[日]池田秀三：《读易纬通卦验郑注札记——周礼との关联を中心に——》，收入[日]中村璋八编：《纬学研究论丛：安居香山博士追悼》，东京：平河出版社，1993年，第378—379页。池田氏在注（2）中倾向卷上为郑注，但同时也承认没有决定性的证据。（第404页）

<sup>③</sup> 钟肇鹏：《谶纬论略》，辽宁教育出版社，1991年，第39页。

<sup>④</sup> 李学勤：《〈易纬·乾凿度〉的几点研究》，《古文献论丛》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，2010年，第190—203页。

<sup>⑤</sup> 此句卢本、范本皆同，惟殿本“王教”作“王道”。

孙”。下句“此帝乙即汤也”则是解释《周易·归妹》六五爻辞“帝乙归妹，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”中的帝乙，即汤。卷上“此帝乙即汤也”句前未引经文而直接作解释，显然此前应当已经出现过“帝乙归妹”之文，似乎先有人发问，然后有托名孔子的回答。李学勤指出《乾凿度》“卷上各段各自论一问题，没有多少内在联系，在形式上很像帛书《易传》的《二三子问》”<sup>①</sup>，从整体上作了提示。《二三子问》的形式是：孔子为二三子讲解《易》，先引“易曰”或“卦曰”（卦爻辞），然后以“孔子曰”的形式进行解释，最后常以“故曰”云云（卦爻辞）作结。<sup>②</sup> 如：

易曰：抗龙有悔。孔子曰：此言为上而骄下，骄下而不信（殆）者，未之有也。圣人之立（莅）正（政）也若遁（循）木，俞（愈）高俞（愈）畏下，故曰抗龙有悔。<sup>③</sup>

如果据此推测《乾凿度》这段文字最初形态，“孔子曰”前当有类似“易曰：帝乙归妹”的文字，亦即“此帝乙即汤也”对应之文。由此也可说明这段文字有较早的来源。

反观卷下，文字虽然大致相同，却仍有几处值得注意的地方。首先，卷上“此帝乙即汤也”一句，卷下作“帝乙则汤”，删去了“此”字。说明卷上的文字直接来自形式与《二三子问》相同的早期文献，“孔子曰”以下应是直接抄录而未加改动，所以“此”字没有对应文句，失于照应。而写作卷下的人注意到了这个问题，所以删去了“此”字。但即使这样，仍显突兀。如果卷上、卷下同出于形式与《二三子问》相同的早期文献，既然卷下的写作者已经注意到了失于照应的问题，那为何不将“易曰帝乙归妹”的文字加入？所以卷下这段文字可能并非出自早期文献，而是出自卷上文字，因为卷上已无“帝乙归妹”一句，所以卷下此处也未加入。此外还有一个更加值得注意的地方，卷上的注文“玄孙之孙，五世之末，外绝恩矣”，到卷下变成了正文“玄孙（按：下脱‘之孙’二字），五世之末，外绝恩矣”，注文“同以乙日生，天锡之命，疏可同名”变成了正文“同日以乙，天之锡命，疏可同名”。可见卷下的作者一定是见过带注文的卷上文字的，并将部分注文改造成了正文。

在一些卷上、卷下重复的段落中，卷下较卷上又有内容上的增衍，如：

《乾凿度》卷上	《乾凿度》卷下
<p>物有始，有壮，有究，故三画而成乾。乾坤相并俱生。物有阴阳，因而重之，故六画而成卦。三画已下为地，四画已上为天。物感以动，类相应也。易气从下生，动于地之下，则应于天之下；动于地之中，则应于天之中；动于地之上，则应于天之上。初以四，二以五，三以上，此之谓应。阳动而进，阴动而退，故阳以七、阴以八为象。易一阴一阳，合而为十五，之谓道。阳变七之九，阴变八之六，（阳动而进，变七之九，象其气息也。阴动而退，变八之六，象其气消也。）亦合于十五，则象变之数若之一也。五音六律七变，由此作焉。故大衍之数五十，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。日十干者，五音也。辰十二者，六律也。星二十八者，七宿也。凡五十，所以大阅物而出之者也。</p>	<p>物有始，有壮，有究，故三画而成乾。乾坤相并俱生。物有阴阳，因而重之，故六画而成卦。卦者，挂也，挂万物，视而见之。故三画已下为地，四画已上为天。物感以动，类相应也。阳气从下生，动于地之下，则应于天之下；动于地之中，则应于天之中；动于地之上，则应于天之上。故初以四，二以五，三以上，此谓之应。阳动而进，阴动而退，故阳以七、阴以八为象。易一阴一阳，合而为十五，之谓道。阳变七之九，阴变八之六，亦合于十五，则象变之数若一。阳动而进，变七之九，象其气息也。阴动而退，变八之六，象其气消也。故太一取其数以行九宫，四正四维，皆合于十五。五音六律七宿，由此作焉。八卦之生物也，画六爻之移气，周而从卦。八卦数二十四，以生阴阳，衍之皆合之于度量。阳析九，阴析六，阴阳之析各百九十二，以四时乘之，八而周，三十二而大周。三百八十四爻，万千五百二十析也。故卦当岁，爻当月，析当日。大衍之数必五十，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。故曰：日十者，五音也；辰十二者，六律也；星二十八者，七宿也。凡五十，所以大阅物而出之者。故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，戒各有所系焉。故阳唱而阴和，男行而女随，天道左旋，地道右迂，二卦十二爻而期一岁。</p>

<sup>①</sup> 李学勤：《〈易纬·乾凿度〉的几点研究》，《古文献论丛》，第194页。

<sup>②</sup> 整篇中只有三处二三子的提问（“二三子问曰”云云）：一处在篇首，直接提问（“《易》屡称于龙，龙之德何如”）；一处在孔子解释完鼎九四爻辞后追问（“人君至于饥乎”）；一处在孔子解释完坤六四爻辞后追问（“独无箴于圣人[之言乎]”）。

<sup>③</sup> 张政烺：《马王堆帛书〈周易〉经传校读·二三子问》，《张政烺文集·论易丛稿》，中华书局，2012年，第150页。

太一行九宫及卦当岁、爻当月、析当日等说皆卷下增衍。又卷上注文“阳动而进，变七之九，象其气息也。阴动而退，变八之六，象其气消也”在卷下中也变成了正文，可见上例并非孤证。

以上两处卷下正文吸收卷上注文的情况说明，今本《乾凿度》的卷上与卷下并非如李学勤所说是“同出一源的不同传本”，而是卷下乃据卷上增衍而成。

关于个别卷上注文变为卷下正文，当然还有一种解释，那就是卷上、卷下均为郑注，郑玄以卷下正文注卷上文字，即李学勤说的“郑注彼此呼应，互相补充”，这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。关于《易纬》的注者，唐代著录并不一致，《隋书·经籍志》《日本国见在书目录》《天文要录》皆作郑玄，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、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则作宋均。隋唐文献征引《乾凿度》，仅《文选·思玄赋》李善注引“五纬顺轨，四时和栗。宋均曰：和栗，气和而严正”一条提及宋均注。宋以后目录均作郑玄注，南宋《中兴馆阁书目》明确说“宋注不传”。今传《永乐大典》残卷及卢本《周易乾凿度》均题“郑氏注”，应是沿宋代传本之旧，所以下后人皆以郑玄注视之。但隋唐文献征引《乾凿度》注，明确说是郑注的，都与下卷注文相合，而不见于下卷的，又往往与上卷注文不同。如《乾凿度》卷上首句：“孔子曰：易者，易也，变易也，不易也。管三成德，为道苞钥。”注文云：

管，统也。德者，得也。道者，理也。钥者，要也。言易道统此三事，故能成天下之道德，故云包道之要钥也。

而《初学记》卷二一文部·经典第一引郑注作：

管，犹兼也。一言而兼此三事，以成其德道之苞钥。齐鲁之间，名门户及藏器之管为钥。（《太平御览》卷六〇九《学部·易》引略同）

《文选》卷二八鲍明远（照）《升天行》李善注亦引“郑玄《易纬注》曰：齐鲁之间，名门户及藏器之管曰钥”。皆与今本卷上之注不同，且无法以“郑注彼此呼应，互相补充”解释，可见卷上此条并非郑注。如果仔细对比卷上、卷下重复段落的注文，也会发现二者有抵牾处，而非互相补充：

卷上的“圣人”，卷下改为“文王”，当是出于文王作《易》的观念。<sup>①</sup>对于这段宇宙生成论的文字，卷上、卷下的注文有不同的阐释。根据卷上的注文，太初是“元气之所本始”，太始是“天象之所本始”，太素是“地质之所本始”，含有这三种“气形质具而未离”的状态叫做“浑沦”，万物都是从这三者中派生出来的。太初并非太易所生，而是“忽然而自生”，太始、太素当亦如此。对于易变而为一，一变而为七，七变而为九，九复变而为一的过程，此注解释为“阳气内动，周流终始”。但同时又认为最后的“一”与最初的“一”不同，并非太初气所生，而是“元气形见而未分者”，即上文的“浑沦”。既然如此，所谓的“周流终始”仅是数字层面的一→七→九→一循环，解释并不圆融，所以下图也无法完全准确地反映此注的观点。一→七→九的变化是阳气由渐生至壮盛，再至终究的气变。此后的“一”则开始了形变，产生了天地，完成了无形到有形的变化。

而卷下注文的解释完全不同，注中认为浑沦是说太素，与卷上注浑沦“含此三始”的说法有异。对于太易、太初、太始、太素，卷下注认为是渐次相生的关系，易、一、七、九则与太易、太初、太始、太素一一对应。除了易→一→七→九的变化外，此注认为还应有易→二→六→八的变化，分别对应气变和形变。这种解释自身较为圆融，但与正文不合。又此注以“七在南方”“九在西方”“六在北方”“八在东方”，亦与卷上“一主北方”“七主南方”“九主西方”之说不同。凡此种种差异，皆说明两注绝非出于一人之手。清人张惠言《易纬略义》云：“凡此书注语，多有不似康成者，旧题郑注，或有错杂。”也表示了对某些注文是否为郑注的怀疑，

<sup>①</sup> 《列子·天瑞篇》中也有此段文字，与卷上一致，亦作“圣人”。晋张湛注：“此一章全是《周易乾凿度》也。”（杨伯峻：《列子集释》，中华书局，1979年，第8页）对于《列子》的成书时代，学界尚未达成一致，或以为先秦古籍，或以为魏晋间人采缀秦汉典籍而成。单从此段文字看，既然与《乾凿度》卷上一致，则《天瑞篇》似乎有较早的来源。如果本文对《乾凿度》卷上时代（西汉）的认定不误，则《天瑞篇》的成立或不晚于西汉。

而张氏此条按语就置于卷上注文“夫物不可穷，理不可极……未济者，亦无穷极之谓者也”之下。<sup>①</sup>考虑到隋唐文献征引《乾凿度》郑注多见于今本卷下，所以卷下注文当为郑玄所作，卷上则绝非郑注。

乾凿度卷上	乾凿度卷下
<p>昔者圣人因阴阳，定消息，立乾坤，以统天地也。夫有形生于无形，乾坤安从生？（天地本无形，而得有形，则有形生于无形矣，故《系》曰：“形而上者谓之道。”）夫乾坤者，法天地之象质，然则有天地则有乾坤矣。将明天地之由，故先设问乾坤安从生也。<sup>②</sup>故曰：有太易，有太初，有太始，有太素也。太易者，未见气也。（以其寂然无物，故名之为太易。）太初者，气之始也。（元气之所本始，太易既自寂然无物矣，焉能生此太初哉？则太初者亦忽然而自生。）太始者，形之始也。（形，见也，天象形见之所本始也。）太素者，质之始也。（地质之所本始也。）气形质具而未分离，故曰浑沦。（虽含此三始，而犹未有分判。《老子》曰：“有物浑成，先天地生。”）浑沦者，言万物相浑成而未分离。（言万物莫不资此三者也。）视之不见，听之不闻，循之不得，故曰易也，易无形畔。（此明太易无形之时，虚豁寂寞，不可以视听寻。《系》曰“易无体”，此之谓也。）易变而为一，（一主北方，气渐生之始，此则太初气之所生也。）一变而为七，（七主南方，阳气壮盛之始也，万物皆形见焉，此则太始气之所生者也。）七变而为九。（西方，阳气所终究之始也，此则太素气之所生也。）九者，气变之究也，乃复变而为一。（此一则元气形见而未分者。夫阳气内动，周流终始，然后化生一之形气也。）一者，形变之始。清轻者上为天，（象形见矣。）浊重者下为地。（质形见矣。）</p>	<p>文王因阴阳，定消息，立乾坤，统天地。夫有形者生于无形，则乾坤安从生？（消息寒温之气而阴阳定，寒温此，<sup>③</sup>三微生着而立乾坤。以天地之道，则是天地先乾坤生也。天有象可见，地有形可处，若先乾坤，则是乃天地生乾坤。或云有形生于无形，则为反矣，如是则乾坤安从生焉？若怪而问之，欲说其故。）故曰：有太易，有太初，有太始，有太素。（将说此也，时人不知，问，故先张所由以为本。使易陵犹故也。）太易者，未见气。太初者，气之始。太始者，形之始。太素者，质之始。（太易之始，漠然无气可见者。太初之气，寒温始生也。太始，有兆始萌也。太素，有质始形也。诸所为物，皆成苞裹，元未分别。）气形质具而未相离，故曰浑沦，言万物相浑沦而未相离。（此极说太素。浑沦，今人言质，率尔有能散之意。）视之不见，听之不闻，循之不得，故曰易也，易无形埒也。（此又说上古太易之时，始有声气曰埒。尚未有声气，恶有形兆乎？又重明之。《礼记·夏小正》十二月鸡始乳也。）易变而为一，一变而为七，七变而为九。九者，气变之究也，乃复变而为一。一者，形变之始，清轻上为天，浊重下为地。（易，太易也。太易变而为一，谓变为太初也。一变而为七，谓变为太始也。七变而为九，谓变为太素也。乃复变为一，一变误耳，当为二。二变而为六，六变而为八，则与上七九意相协。不言如是者，谓足相推明耳。九言气变之究也，二言形之始，亦足以发之耳。又言乃复之一，易之变一也。太易之变，不惟是而已，乃复变而为二，亦谓变而为太初。二变为六，亦谓变而为太始也。六变为八，亦谓变而为太素也。九，阳数也，言气变之终。二，阴数也，言形变之始。则气与形相随也。初太始之六，见其先后耳。《系》曰：“天一，地二，天三，地四，天五，地六，天七，地八，天九，地十。”奇者为阳，偶者为阴，奇者得阳而合，偶者得阴而居，言数相偶乃为道也。孔子于《易系》著此天地之数，下乃言子曰，明天地之道本此者也。一变而为七，是今阳爻之象。七变而为九，是今阳爻之变。二变而为六，是今阴爻之变。六变而为八，是今阴爻之象。七在南方，象火。九在西方，象金。六在北方，象水。八在东方，象木。自太易至太素，气也，形也，既成四象，爻备于是。清轻上而为天，重浊下而为地，于是而开阖也。天地之与乾坤，气形之与质本，同时如表里耳。以有形生于无形问，此时之言，斯为之也。）</p>

此外，卷下注文内部也有相应的证据。如注文解释“一岁积日法”，谓“今计已多积候，故会稽尉刘洪《乾象》法已为五百八十九分[日之](之日)百四十五”，提及刘洪《乾象历》的岁实(回归年)长度。据《晋书·律历志》，郑玄于汉献帝建安元年(196)受此法，又加注释，可见为《乾象历》专家，故于注中引及此说。

第三个问题是上下二卷拼合的时间问题。既然郑玄所注仅为卷下，那么认为“郑玄时业已拼合在一起”的说法也就没有根据了。相反地，根据上文的分析可以推知，郑玄见到的《乾凿度》文本应该仅相当于今本的卷下，故而只注这一部分。这种推测在郑玄的经注中也可以得到印证。如《礼记·檀弓下》“舍故而讳新”，郑玄注引《易说》云：“《易》之帝乙为成汤，《书》之帝乙为六世王。天之锡命，疏可同名。”所谓《易说》即《易纬》，<sup>④</sup>郑玄所引是上文举例的《乾凿度》卷上、卷下重出段落。但卷上正文无“天

<sup>①</sup> 张惠言：《易纬略义》，清光绪中广雅书局刊民国九年番禺徐绍棨汇编重印《广雅书局丛书》本，卷一，第5b页。

<sup>②</sup> 钱本“象质然”三字、“由故先”三字空缺，今据殿本补。

<sup>③</sup> 张惠言《易纬略义》云“寒温此”三字衍。（清光绪中广雅书局刊民国九年番禺徐绍棨汇编重印《广雅书局丛书》本）

<sup>④</sup> 《礼记正义·檀弓下》云：“《易说》者，郑引云《易纬》也。凡郑云‘说’者，皆纬候也。时禁纬候，故转‘纬’为‘说’也。故《郑志》张逸问《礼注》曰：‘《书说》，《书说》何书也？答曰：《尚书纬》也。当为注时，时在文网中，嫌引秘书，故诸所牵图讐皆谓之‘说’云。’”

之锡命”四字，在注中，而郑玄引的恰恰与卷下正文相合，可见郑氏所见《乾凿度》相当于今本的卷下。<sup>①</sup>

还有一点值得注意，隋唐文献中征引的部分《乾凿度》郑注不见于今本卷下。如上文所举《初学记》《太平御览》引《乾凿度》皆有正文，有郑注，而正文见于今本卷上，郑注则不见于今本。可能的解释是，郑玄作注的文本比今传本卷下的内容要多。即《初学记》等所引正文原本亦存在于卷下，郑玄为之作注。而在卷上、卷下合并的时候，整理者将卷下这段与卷上重复的文字删去，正文既然不存，郑注也就无所附丽，所以被一同削除。如果这一推论成立，则上下二卷合并的时间当较晚，至少不早于唐初。上例亦非孤证，如《毛诗正义·采菽》《春秋正义·桓公二年》《春秋公羊疏·桓公四年》皆引《乾凿度》郑注：

古者田渔而食，因衣其皮。先知蔽前，后知蔽后。后王易之以布帛，而犹存其蔽前者，重古道，不忘本。<sup>②</sup>

《采菽》“赤芾在股”郑笺云：“芾，大古蔽膝之象也。”芾（紱）即蔽膝。此条郑注不见于今本《乾凿度》，根据内容看，对应的正文应是：

孔子曰：紱者，所以别尊卑、彰有德也。故朱赤者，盛色也。是以圣人法以为紱服，欲百世不易也。

故困九五，文王为紱三公，故言“困于赤紱”也。至于九二，周将王，故言“朱紱方来”，不易之法也。

具体来说，应在“是以圣人法以为紱服，欲百世不易也”句下，解释圣人造作紱服（蔽膝）的原由。而在今本中，这段正文仅见于卷上，此句下并无注文，说明《乾凿度》卷下原本应有此段正文及郑注，后被删去。

又如《玉烛宝典》卷一引《乾凿度》曰：“三王之郊，一用夏正。天气三微而成一著，三著（谦按：‘三著’二字旁添）而成体。方此之时，天地交而万物通，所以法天地之通道。郑玄曰：三微而一著，自冬至正月中为天，郊之也。”<sup>③</sup>同样是有正文，有郑注，正文见于今本卷上，但无此郑注。今本《乾凿度》书末有后人附注，可析为三条，皆驳郑注之文，其中第一条为：

夫天道三微而成一著，三著而体成。（三微而成一著，自冬至正月中为泰卦。三著成体，则四月为乾卦。以三微一著之义，则与三著成体不协，盖写之误也。原经之义，三而成一著，一爻也。

三著成体，乃泰卦也。是则十日为微，一月为著矣。十有八变而成卦之数，恐未尽注义，故不改。）孙诒让云：“此正文二句，与上文不相属，而与前孔子说《益》六二义‘三王之郊，一用夏正’章文正同。注‘三微而成一著’二句，亦与《玉烛宝典》引郑注略同。以下云云，又皆驳郑注义，盖后人约举正文及注，而驳正其义。旧本当别书附缀册末，传写者误连属末章之后耳。”<sup>④</sup>这段文字既然以郑注为驳正对象，则此人附识时，此条正文及郑注尚存，同样证明了上文对今本卷下是经人删削而成的推断。

关于卷上正文的写作时间，帛书《二三子问》抄写于汉文帝初年，<sup>⑤</sup>卷上正文既然是摘编、改写此类文献而成，则成书时间当晚于汉初。又马王堆帛书《系辞》尚无“大衍之数五十”一章，张政烺认为今本中的“大衍章”是后加的，是西汉中期的作品。<sup>⑥</sup>而《乾凿度》卷上正文中有关“大衍之数五十”的文

<sup>①</sup> 当然，似乎也有一个反证。《礼记正义·檀弓下》云：“案《易》云‘帝乙归妹’，《易乾凿度》说《易》之帝乙谓是殷汤也。‘《书》之帝乙六世王’者，亦《易纬》言也。……‘天之锡命，疏可同名’者，此注《易纬》语也。”也就是说，《正义》认为“《易》之帝乙为成汤，《书》之帝乙为六世王”是《乾凿度》之文，“天之锡命，疏可同名”是注《乾凿度》之语。而“天之锡命，疏可同名”一句恰在卷上注中，按《正义》所说，似乎此注为《乾凿度》郑注之语。但在《乾凿度》卷下正文中，“天之锡命，疏可同名”句在前，“《易》之帝乙为成汤，《书》之帝乙为六世王”句在后，二句并不相连。细绎郑玄之意，当是有意调整引文次序，以便语义通顺连贯，并非先引一句正文，再加一句注释。《正义》可能未细检《乾凿度》原文，理解有所偏差。总之，此一反例似不能推翻本文之推论。

<sup>②</sup> 引文据《毛诗正义》、《春秋正义》、《春秋公羊疏》略同。又《毛诗正义》引作“易乾凿度注”，《春秋正义》引作“郑玄易纬乾凿度注”，《春秋公羊疏》引作“郑注易说”。

<sup>③</sup> 杜台卿：《玉烛宝典》，清光绪间影刊日本旧钞卷子本（《古逸丛书》之十四）。文字略有脱讹。

<sup>④</sup> 孙诒让：《札逐》卷一，中华书局，1989年，第5页。

<sup>⑤</sup> 张政烺：《帛书〈六十四卦〉跋》，《张政烺文集·论易丛稿》，第59页。

<sup>⑥</sup> 张政烺：《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》，《张政烺文集·论易丛稿》，第9页。

句,如果张氏推论成立,则其成书不早于西汉中期。<sup>①</sup> 李学勤也指出,卷上有对《系辞》《说卦》的引申铺陈,其中以八卦配十二月,是汉易卦气说的原型,对“大衍之数”的推阐,代表了由义理易学向象数易学转变的关捩,<sup>②</sup>同样说明卷上成书不会早于帛书易传和今本“十翼”。

需要附带指出的是,从卷上自身的文本内容看,各条说法偶有抵牾,说明其有不同的文献来源。如对《困》九二爻辞“困于酒食,朱紱方来”的解释,其中一条说:“周将王,故言‘朱紱方来’。”也就是说,朱紱是天子所服,而周将要取代商为王,所以说将要服朱紱。而相邻的下一条则认为:“赤(谦按:当作朱)紱者,赐大夫之服也。文王方困,而有九二大人之行,将锡之朱紱也。其位在二,故以大夫言之。”这是说,朱紱是天子赏赐大夫之服,九二从爻位上看为大夫,<sup>③</sup>文王“有九二大人之行”,故所服同于大夫。此条之注文云:“文王虽纣三公,而为小人所困,且进不得伸其职事也,故遂同于大夫。二为大夫也。”应当合乎正文原意。可见这两条正文对同一句爻辞的解释并不相同,原因只能是各自的来源不同。

### 三

基于以上论证,关于今传《周易乾凿度》形成、演变的过程,比较合理的推断是:西汉中期,有人根据早期不同的易传类文献摘编改写为一个文本(相当于今本卷上的正文,简称甲本),此后有人为之作注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“六艺略·易”中有“《古杂》八十篇”,此甲本或在其中。两汉之际,又有人根据带注文的甲本,增改扩充为一个新文本(相当于今本卷下的正文,但内容更多,简称乙本)。当时的乙本应该包含甲本正文的大部分内容,又将极少量甲本注文吸收为正文,但未保留其余注文。东汉初校定图讐八十一篇,以“乾凿度”为乙本之名,东汉末郑玄为《乾凿度》(乙本)作注,流传于世。而甲本并不流行,或许仅藏于中秘。魏晋至初唐文献所引《乾凿度》,应当都是郑玄作注的乙本。大概在唐代中期,有人将甲本(佚名注)和乙本(郑玄注)合并,以甲本为卷上,乙本为卷下,又将乙本与甲本正文完全重复的部分进行了删除,形成了今传二卷本《周易乾凿度》。可以提供的一个旁证是,同为《易纬》之一的今本《稽览图》中,包含有南北朝易占之书《易三备》和易图之书《易通统轨图》等内容,且有晚至元和之年号,这些内容应是唐代李淳风之后陆续增益的结果。<sup>④</sup> 由此可见,唐人确实曾对《易纬》进行过一些整理与增益。

当然,关于甲本一直藏于中秘,不为人知,至唐代中期才被重新发掘的推测,似乎不符合一般的文献流传规律。这只是在当前条件下得出的较为合理的推断,而对几个时间节点也只能作比较粗略的估计。但基于隋唐文献的征引和卷上、卷下注文的抵牾情况,今本《乾凿度》卷上非郑玄注则是可以确定的。总之,《周易乾凿度》反映了汉代文献在流传过程中,文本被不断增衍、删并的复杂情况,提示我们面对今传本早期文献,应当充分考虑、细致分析其文本的层次性,而非仅以单一文本视之。同时,作为《易纬》之一,《周易乾凿度》也是我们考察汉代纬书文本形成过程的重要依据。

(作者单位:北京大学中文系)

责任编辑:章伟文

<sup>①</sup> 与张政烺不同,李学勤认为“大衍章”的起源不可能晚,应在《系辞》形成的时期已经存在,帛书《系辞》无“大衍章”只是当时不同传本的出入(李氏认为帛书易传为楚人所传)。见李学勤:《周易溯源》,巴蜀书社,2006年,第340—342页。如果李氏推论成立,则《乾凿度》卷上成书的时间上限可稍稍提前。

<sup>②</sup> 李学勤:《〈易纬·乾凿度〉的几点研究》,《古文献论丛》,第194—196页。

<sup>③</sup> 《乾凿度》卷上云:“初为元士,二为大夫,三为三公,四为诸侯,五为天子,上为宗庙。”许慎《五经异义》:“谨案:《易》爻位,三为三公,二为卿大夫。”(陈寿祺:《五经异义疏证》卷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2年,第183页)

<sup>④</sup> 参见拙文《今传〈易纬稽览图〉的文本构成——兼论两种易占、易图类著作的时代》,《国学研究》第44卷。